

文字的角色

——在香港新界的一些田野研究經驗*

廖迪生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今天，香港教育普及，很多人都有基本的閱讀能力，但這個普及教育的進程，只是在1960年代才慢慢開始。近代中國戰亂及政治運動頻繁，令很多人流離失所，喪失了接受教育的機會。¹我們在香港新界進行田野研究時遇到的受訪者，很多都經歷過這些艱辛，並且少有讀書的機會。但偶爾我們也會遇見一些讀書人，他們解答我們對地方歷史、傳統禮儀、節慶或風水等方面的問題。很多時候，他們更與我們分享他們所收藏的契約、族譜及尺牘等與地方社會有密切關係的文字材料，而這些都是研究人員夢寐以求的「寶物」。許舒指出讀書人對文字的掌握，讓他們在地方社會中，佔據著一些特定的位置。²

個人的名字

在新界研究「太平清醮」的時候，我體會到文字在儀式中的角色及其重要性。在一連數天的太平清醮裡，有一個「上榜」的儀式，目的是張貼一幅寫上所有參與者名字的紅紙。一個大規模的太平清醮可以有數千個參與者的名字，「榜文」紅紙可以長達數十公尺，而喃嘸先生在榜文上簽名後便將之張貼。但儀式還未完結時，村民已急不及待的找尋自己及家人的名字。當發現有錯漏的地方，儘管儀式還在進行中，也會馬上要求喃嘸先生將之改正。人們不希望神明或坊眾錯過他們的名字，雖然這張榜還會張貼數天，在太平清醮完結時才被焚化。

「祭大幽」是太平清醮的壓軸儀式，在晚上由喃嘸先生進行，目的是祭祀幽魂，儀式在醮場外、村民選定的地點進行。儀式前，村民將監督幽魂的紙紮「大士王」自醮場搬到祭大幽的地點。過程中，村民將大士王帶到他們認為鬼魅比較多的地點短暫停留，說是把幽魂趕走。這

個「遊大士」的活動，由村中男士執行。在過程中，村民強調大家不可呼叫別人的名字，因為若果讓幽魂「聽」到他們的名字的話，便會為他們帶來惡運。³

公共設施的維持需要大眾的支持，例如很多歷史悠久的廟宇之可以維持到今天，是有賴因為不斷維修。為了表揚及鼓勵捐助的人，很多廟宇內的碑銘文字，都記錄了廟宇重修的原因及捐助者的姓名。也許在廟宇碑文上有名字的人，會得到神明的特別照顧。香港不少廟宇內都有二、三百年歷史的碑銘文字，是珍貴的地方歷史材料。

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裡，男性比女性有較多接受教育的機會，羅友枝指出，在20世紀之前的中國社會，女性並沒有機會接受有系統的教育。⁴即使是很多曾接受教育的男士，所認識的文字也不多，主要是用來應付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對他們最重要的，可能是能夠認出自己及他人的名字。⁵華若璧指出一個人的名字的應用方式與他所處的社會位置有著緊密的關係。⁶在過往香港的新界，嬰兒要到滿月的時候，才有一個名字，表示他是一個「人」。在宗族社會裡，家長要在男嬰出生後的第一個正月十五，為他參與安排點燈儀式，讓男嬰的名字被登記在族譜裡，成為宗族的一員，享有宗族成員的權利，但當然也包括成員的義務。雖然香港地區的漁民沒有組成宗族，沒有族譜登記新生男丁的名字，但一般漁民家庭都會擁有一塊紅布，上面寫著父母及子女的名字及各人的時辰八字。

我在珠江三角洲、香港新界元朗及離島社區發現，男性農民及漁民，一生中並不一定只有一個名字。在結婚的時候，新郎會舉行一個「請大字」或「安大名」的儀式，一個寫有新郎新名字

的匾額會在新居中掛起，然後新郎向自己的新名字叩拜。若果婚禮是新郎及新娘的成年禮的話，這個大字或大名，便是男子進入成人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⁷

在南中國社會裡，女子出嫁後，便成為夫家宗族的成員。但她在宗族的位置是透過丈夫及兒子的關係而獲得的；她沒有權利參與父親宗族的點燈儀式，結婚時也沒有機會去獲得一個新的名字。因為在以父系繼嗣原則運作的宗族社會裡，女兒是沒有一個繼嗣的角式的；所以她的名字變得沒有意義。人們對她的稱呼，也因應她在夫家的地位的轉變而有所改變。⁸ 她在族譜裡或祖先神位上面，出現的只是她父親的姓氏。

在傳統社會裡，窮人沒有能力捐助支持公共設施，因此他們的名字也不會在這些設施的碑銘文字中出現；女子的名字也因為父系繼嗣原則而沒有被採用，她縱然有所貢獻，出現的也只是她兒子的名字。總的來說，窮人及女人的名字都被隱藏了起來。

社會階層分野

在王朝時代南中國邊緣地方的宗族，是控制地方資源的社會組織：以一個共同祖先的名義將一群居住在一起的同姓子孫組織起來；也以祖先的名義，擁有以土地為主的族產，作為宗族的經濟基礎。在12世紀時，屏山鄧氏宗族的祖先在香港新界元朗定居，控制了肥沃的平原，稻米耕作成為宗族組織的主要經濟活動，一直到1960年代，元朗平原還是香港主要的稻米產地；鄧氏宗族也是香港新界一個比較富有的宗族。Jack M. Potter在屏山進行人類學研究，以屏山的例子，把南中國的宗族組織與結構，仔細的描繪出來。⁹ 佛里德曼也以屏山及其他香港新界鄧姓宗族之間的關係，指出地方宗族以共同的祖先作為符號，聯繫組成一個跨地區的「高階宗族」(high-order lineage)，發揮地方政治的影響力。¹⁰

宗族可以是一個龐大的地方集團，成員眾多，如何管理成員、處理龐大的族產、讓宗族成員分享權利與履行義務、以及協調房派之間的關係，都不是簡單的事情。族譜是宗族管理的重要

記錄文獻，宗族祖先的來歷、祖先山墳的風水位置、宗族成員的名字及他們之間的譜系關係等都記錄在裡面。因此，宗族資源的控制和管理與文字的使用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傳統社會，一般人讀書的目的是功能性的，是要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一般人並沒有寫文章的能力。在鄉村裡提供的教育可以是比較簡單的，只需要一位「教書先生」及一個上課的地方。但村裡可以上課的地方不多，大多是在宗族的祠堂。¹¹ 教育需要財富來維持，由於一些富有的宗族可以支持教育經費，¹² 宗族子孫不用繳付高昂的費用便可以有讀書的機會。但對一般沒有宗族教育設施的農民來說，他們將小孩送到鄰近宗族的書室唸書，便要為他們繳交學費，或是給老師米或柴，這都不是容易負擔的。

在王朝時代，科舉是社會流動的階梯，富有的宗族會培養子姪考取功名，成為士大夫，幫助宗族的發展和鞏固宗族的地位。作為富有宗族的貧困成員，也可以獲得一些教育的機會。但對在南中國沿海，住在船上的漁民來說，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參加科舉考試，長久地被拒之於教育門外，令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所以，教育是社會階層、宗族內部分野的一個主要元素。

地方社會表述

香港農業在1960年代開始衰落，失去競爭力，不少農民為了謀生而離開自己的土地，年青一輩都跑到市區工作，也有不少移民歐洲。到了今天，鄉村內已經沒有多少年青村民，只剩下一些老人家。宗族成員散居在香港及世界不同地方，成員間的互動超越了本來宗族鄉村的範圍。華琛指出1990年代的新界宗族社會是後現代時期，形成中的「離散社群」(diaspora) 的一部份。¹³

今天，很多大宗族的祠堂、祖墳、族產及古老建築物依然存在，但很多宗族的傳統活動卻因為參與成員的減少，正慢慢地消失。然而很多地方傳統還存在於地方人士的記憶裡，或在人與人之間口語相傳，例如是盆菜的烹調方法、地方的傳說故事、人生禮儀內容等等，這些都成為今天

新界居民懷緬的事物。¹⁴

1898年，中英兩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1899年，屏山的鄉民聯同其他新界居民與英軍對抗，反對英國接管新界。夏思義稱之為「六日戰爭」。¹⁵ 這段歷史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並不彰顯，今天卻是屏山居民的光輝事蹟。英國人後來容許新界居民保持他們的風俗習慣，而這個「優待」也成為今天新界原居民的權益。在這數十年來，新界都市擴展，原居民的土地萎縮，他們感覺到自己的權益不斷受到挑戰，這也促成了他們要書寫自己的權益。

宗族的歷史、古老的建築物及傳統的風俗習慣漸漸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屏山保留了的歷史建築物，不單盛載著屏山的歷史，也是新界及南中國歷史的載體。在政府相關部門的推動下，香港第一條文物徑——屏山文物徑——於1993年12月成立，將鄧氏祠堂、廟宇、古井、圍村建築及古塔等組成一條展示圍村文化的步行徑，這是利用宗族文化資源的一個開端。

今天，鄧氏宗族的經濟與社會組織功能已經不復從前，宗族成員也不是同住在一條鄉村裡。屏山文物徑可以說是鄧氏宗族組織形態轉變的一個轉捩點，屏山文物徑讓鄧氏宗族有一個展示自己歷史文化的環境。而宗族的知識份子，也同時以文字書寫的方法來表述宗族的歷史，歌頌宗族傳統。這些書寫地方社會與歷史的文字表述，把屏山歷史事件重新整理，塑造新的宗族鄉村歷史。¹⁶ 屏山文物徑也成為宗族成員認同的一個符號、維繫宗族成員的新元素。

個人能動性

蕭鳳霞在珠江三角洲新會的研究，指出個人能動性（human agency）的重要性。她認為國家體系之能夠進入地方，是因為有地方的支持者，而這些支持者非常熱心追求國家認可的權力。¹⁷ 雖然香港與中國大陸屬於兩個很不一樣的政治體制，但在個人能動性方面，也有類似的方面。以對影響屏山地方事務的政府政策來說，宗族精英擔當著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屏山文物徑是熱心的政府官員與積極的屏山精英合作的產物。¹⁸

宗族組織形態改變後，在面對外來壓力的時候，也有不一樣的回應方式。1995年政府強遷屏山鄧氏宗族位於稔灣的祖墳，屏山鄧氏宗族成員便關閉文物徑的設施，以示抗議。經過漫長的談判，最後雙方同意擇地重新安葬屏山鄧氏祖先骨殖，並將舊屏山警署改建為「屏山鄧族文物館」。屏山精英以文字提出訴求，記錄確認政府的回應，¹⁹ 在這個個案中，文字作為記錄及意見表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成為宗族爭取權益的一個新途徑。

鄧昆池及鄧聖時先生是屏山鄧氏宗族的成員，他們主動自發地維持這個表述的傳統。鄧昆池先生是唸獸醫的，退休前在政府漁農處工作；鄧聖時先生在廣州唸法律，然後在海南島當法官，在文革期間受到很多傷害，退休後返回屏山定居。兩位鄧先生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他們都以自己的宗族為榮，就是在退休後，花了很多時間撰寫與屏山鄧氏宗族有關的文章，²⁰ 表述與弘揚宗族的歷史與文化，以書寫的方法來爭取屏山的地方利益。鄧昆池先生義務地向公眾及學生現場講解他們宗族的歷史及典故；鄧聖時先生則將祖傳的清代居所改成地方歷史文化展覽館，免費向公眾開放。屏山有很多讀書人，但並不如鄧聖時及鄧昆池先生一樣，有這方面的堅持。

由盧惠玲小姐及張兆和博士合編、鄧聖時先生輯的《書寫屏山》收錄了元朗屏山鄧氏宗族成員不同時期的文章，以及有關元朗屏山鄧氏宗族的歷史文化、官民信件及報刊評論等文獻資料。這些材料記錄了屏山的歷史與社會的變化，但更重要的是反映著讀書人如何看待屏山的社會與歷史，以及如何參與地方社會與文化的建構。

註釋：

* 廖迪生著〈序〉，載盧惠玲、張兆和編，鄧聖時輯，《書寫屏山：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本土歷史傳統季編》（香港：香港華南研究中心，2013）。

¹ 參看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

² James W. Hayes, "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 in the Village World,”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75-111.
- ³ 參看廖迪生，〈一個30年的約會：記井欄樹村「安龍清醮」〉，《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12，第66期，頁1-6。
- ⁴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 6-8.
- ⁵ 科大衛，〈論一九一〇年代新界區的識字率〉，《明報月刊》，1983，第18卷，第2期，頁90-92。
- ⁶ Rubie S. Watson,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 1986, vol. 13, no. 4, pp. 619-631. (中譯本：華若璧，〈有名與無名：中國社會的性別與個人〉，載《鄉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別及禮儀》，華琛、華若璧著，張婉麗、盛思維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163-180。
- ⁷ 廖迪生、張兆和，《大澳》(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頁123。
- ⁸ 參見Rubie S. Watson,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 ⁹ 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¹⁰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1), pp. 19-22. 另參看James L. Watson,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hina Quarterly*, 1982, vol. 92, pp. 608-609。
- ¹¹ 有關新界的鄉村教育概況，參看明基全編輯，何惠儀、游子安撰文，《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1996)。
- ¹² 吳倫霓霞，〈新界上水鄉的教育發展〉，《明報月刊》，1983，第18卷，第2期，頁85-89。
- ¹³ James L. Watson, “Presidential Address: Virtual Kinship, Real Estate, and Diaspora Formation—The Man Lineage Revisit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4, vol. 63, pp. 893-910.
- ¹⁴ 參看廖迪生，〈「非物質文化遺產」：新的概念、新的期望〉，載《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廖迪生編(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文化博物館，2011)，頁5-14。
- ¹⁵ Patrick H. Hase,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¹⁶ 參看Lo Wai Ling, *Power of Heritage: Sustenance of Lineag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M.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 ¹⁷ 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3-294.
- ¹⁸ 鄧慶業，〈關於繼續合作發展和開放屏山文物徑的構想〉，載《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彙編》，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07)，頁400-401。
- ¹⁹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彙編》。
- ²⁰ 鄧聖時，《屏山鄧族千年史探索》(香港：鄧廣賢，1999)。